

想我写出一部像柴可夫斯基钢琴协奏曲那样的作品。”

在上海念完小学，罗伟伦便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念附中，后来完成大学教育。1967年，罗伟伦毕业时很不幸地碰上了文化大革命。隔年，他下乡去到天津葛沽，在农场种地养水稻。他说当时年轻不了解政治的凶险，还一度代表众人向中央写信讨公道，“结果被关起来隔离审查，两年半的时间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。”

罗伟伦被批斗以至昏倒，当局要他交代罪状，他不知道要怎么写，灵机一动就抄《毛泽东选集》，“全部五卷当笔记，他们不能阻止我，否则就成反革命了！”

1973年，罗伟伦被分配到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音乐组担任作曲。这一段经历对他后来的创作有着极大影响。和摄制组一起去矿场、油井，到云南拍《滇藏路纪行》，艰辛的旅程，壮丽的风光让他的音乐从此有了画面感。

“我创作中的概念是画面感，不只是音符。构思都是在‘动’的当中形成，例如公共汽车、脚踏车上。来到新加坡后，也是在我家附近的公园里一边散步，一边踩脚踏车，很多作品的主要旋律都是在‘动’当中出来的。”

离开香港选择了新加坡

经历过文化大革命、大饥荒，罗伟伦一度对中国社会非常灰心。1980年他离开中国大陆到香港去找他当翻译的大哥。“我不想留在中国，家庭和个人受到很大的冲击，被抄家，值钱的东西都被扔掉。心灰意冷。更不想下一代有这样的经历。”

他在香港创业的初期并不容易。1980年代的香港对内地的新移民相当歧视，据罗伟伦说，只要说不好广东话或说普通话的就很难被接受，想收学生教音乐更难上加难。“人家说穷得叮当响，我是穷得叮当都不响，口袋里连几个硬币都没有。”

罗伟伦说，一直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后，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新移民的态度才有了改变，觉得他们也是有追求有不同思考的人。他在香港的作曲事业也开始有所建树。他成了香港演艺学院的创院教师之一，主教中乐编配，也创作了《白蛇传》、《大理风情》等作品。

步入1990年代，香港即将回归中国，罗伟伦又再一次决定离开。他选择来新加坡。“我之前完全没来过新加坡。不过想象中这是个华人为主的社会，也曾经是英国殖民地，应该不会和香港差太远。有了香港生活的经验和积累，生活也就没有太大担忧。”

1995年来到新加坡，罗伟伦发现比起香港，这是一个包容度更大的社会。“在香港你必须能说广东话，但是在新加坡我基本上用华语也能够生活得很好，所以变成惰性，没把英语学好。”罗伟伦说这是他移民新加坡17年来较大的遗憾。

不想创作标准式“南洋音乐”

来到新加坡，他得到不少本地音乐家的帮助，包括刚来时由我国作曲家潘耀田介绍他到南艺开班授课。后来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叶聪也给了他乐团合作的机会，演奏罗伟伦创作的多首以新加坡

怒放，色彩性很强。我也通过到邻近国家及中国南方采风来了解南洋风格。其实南洋音乐究竟是怎么样的，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，需要更多人的集思广



罗伟伦1962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。



罗伟伦（右）和妻子冯雪芳（左），与正在服役的儿子合照。

“我当然希望受到本地人的认可。但我并不想创作标准式的‘南洋音乐’，而是我心目中及观察体会到的南洋。”

——罗伟伦

益。我只是从我的角度去写。一个地区和国家要有代表自己的文化，华乐是其中一个形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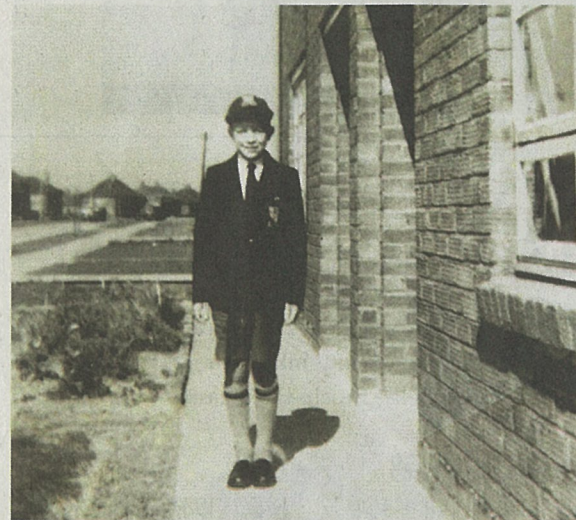
他说，在音乐发展方面，新加坡有自己的长处，这里的华乐普及程度比发源地来得广泛，曲路和接受度很广，这也是要华乐走向国际的必备基础。此外，他很享受新加坡华乐团成员之间的融合度，“乐团有很强的包容性。我们的创作碰到问题，他们会帮忙解决，不同声部聚在我家讨论，有时一起弄到很晚。很多乐团有门户之见，分党分派，新加坡华乐团有本地、中国各地的团员，却能融合共处。”

末了，罗伟伦说，自己北京话说得不像北京人，上海话也不够纯正，广东话也不好，所以最适合叫做家的地方应该就是新加坡了。他传给记者的照片，从小在新加坡长大、正服兵役的儿子站在他和太太中间，英姿飒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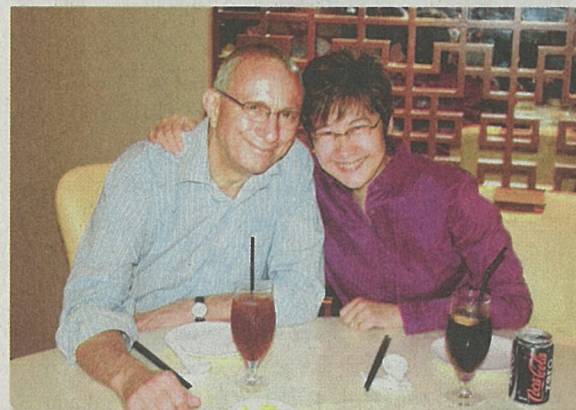
听华特森形容自己的童年和成长岁月，和罗伟伦成了很大对比。华特森的童年在英国米德尔斯布勒（Middlesbrough）度过，他回忆说：“当时我们的

“移民社会的共同体验或许是迁居的感受和勇气。移民所表现出来的‘勇’让我尤为感动。”

——华特森



华特森的童年在英国美好的大自然怀抱里度过。



音乐家华特森（左）与妻子温莉。

房子在乡间，放眼望去就是山丘、田野、大自然，孩子们在那里嬉戏、踩脚踏车，非常愉快。”

华特森学习的第一种乐器，是本地小学生非常熟悉的竖笛，他11岁开始学钢琴和小提琴。父母虽然不是搞音乐的，但对音乐都很有兴趣。“父亲还问我可否教他弹钢琴，一教就是几年。母亲是那类听了某首乐曲就能在钢琴上弹出来的人。”

音乐的种子很早就在华特森心里发芽成长。年少时成为米德尔斯布勒青年交响乐团的成员，18岁到伦敦三一音乐学院学习，作曲是他从小的志愿。“音乐在我脑子里是形象化的存在。念中学的时候我就开始为学校乐团编曲及作曲。”

重新找到音乐与观众的联系

1960年代的伦敦，给了华特森一个精彩的学习环境。学习不仅局限在课堂里，更是整个城市的氛

众交流的精神面。“我突然没有创作的动力，觉得自己写的那些当代古典作品与时代脱节，结果有6到8年时间没有发表作品。”

后来重新拾起创作信心，是由于一些剧团演出需要配乐，找华特森帮忙。为这些想象中的场景写音乐，他从中找到不一样的乐趣。“剧场很神奇，可以是古希腊的，可以是《推销员之死》的情境，也可以是《秘密花园》的甜美。观众的反应是直接的，所有抛出去的思想火花都要抓住观众的想象和情绪。剧场音乐把我从殿堂式音乐创作里拉出来。作曲家不是高高在上的，音乐应该是情感交流的工具，而不是成为观众必须跨越的一道理解障碍。”

在文化碰撞中找到力量

在这寻觅音乐创作之路的过程中，他与来自马来西亚檳城，到英国念法律的太太温莉（译音）相识结婚。他说因为太太的关系，自己和新加坡有了联系，来回好几次以后，他们在1990年决定把事业和家庭搬到新加坡来。而这里给了华特森一个与英国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。他说：“来了以后，被迷倒了！有很多第一次的体验。新加坡在文化上极其丰富，是精彩纷呈的社会，有很多不同人种、文化，有时候融合得很好，有时候仅是并肩存在。我觉得一点都不输给英国的文化氛围。”

华特森在本地找到了新的创作力量和营养，他开始进入创作高峰期，发表了许多融合各个乐器，有时叫人无从归类的作品。

因为对异族文化的理解和欣赏，华特森发现回头更清楚地看到欧洲音乐传统里的美好。“不同的思想碰撞在一起往往可以照亮彼此。如果你向来在某个音乐领域钻研，再接触另一个不同的乐种，它们将能带来新体会，让你看到新的创作方向。”

作为一个以外来者身份创作本地音乐的人，华特森很清楚每一个乐种都有自己的传统。“传统很重要，因为很多时候最好表现乐器的方式是传统的方式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我为华乐团写音乐，并不代表我写的就是华族音乐，因为我到底不是华人。我考虑的是整个声音，是音响的世界，不局限于某一种乐种或者乐器。”

华特森说自己第一步真正踏出去，想要用音乐触碰生命的作品就是2006年参加新加坡国际华乐作曲大赛的一等奖作品《挂毯：时光飞舞》。

谈到新加坡给予他的养分， he 说是色彩感，视觉上的无限生命力，一种属于热带生活的基调。作为一个移民，他能感觉到与新加坡这个传统上一直是“移民”社会之间的互动。“移民社会的共同体验或许是迁居的感受和勇气。移民所表现出来的‘勇’让我尤为感动。”

对于寻找“南洋”音乐的过程，华特森表示尽管有时候会怀疑是否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未来乐种，还是应该让它有机地自由地成长。但回头看看新加坡的历史，他又发现或许创造和有机的成长之间并不矛盾，它们相辅相成，才成就了富有生命力的当代文化。

《新汇点》内页

■澳籍新移民开班教导女佣烹饪

>> p4 & p5